

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

卢凌宇 周 盛

内容提要：“奥卡姆剃刀”原则强调理论的简约性，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从经验上看，在相互竞争的诸种理论中，往往是结构和逻辑更简单的那个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广的传播，因而更具生命力。简约的理论未必“正确”，但在主观上，简约性符合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水平：人的脑和神经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够轻易地记忆和处理复杂知识的阶段，相反，会本能地追求简单便捷；在客观上，简单的理论便于建构和检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奥卡姆剃刀”原则为“工具主义”者所强调，但对“实在论”者而言，简约主义的缺点是重结果轻过程，无视理论过程的真实性。“工具主义”者则反驳说：第一，在主观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事实的投射，而是学术共同体的信念和技术操纵的结果；第二，在客观上，理论的真实性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受制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特点，既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既然真实性本身是存疑的，那么简约性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而言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关键词：“奥卡姆剃刀” 简约性 工具主义 实在论 国际关系理论

一 简约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简单的理论更可取”(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 virtue)是科学哲学中一个著名预

^{*} 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人富于洞见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中尚存的错漏，由作者负责。

设。这个观念几乎和科学一样古老。^①古往今来,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这个预设做了很多不同的阐释。亚里士多德曾在《后分析篇》中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基于较少假定的推演或猜想具有优先性。^②此后,阿奎那(Thomas Aquinas)、康德、牛顿、伽利略和爱因斯坦等都对该原则做了阐发,其中最著名的表述是“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它是14世纪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贡献的哲学思想。后世哲学家把威廉的这个思想归结为“若非必要,勿增实体”。^③按照威廉自己的表述,“奥卡姆剃刀”就是“如果可以用较少的事来实现,那么更多的事情是无用的。”换言之,如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假定就可以把问题解释清楚,就不必去假定。^④威廉的思想对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逐渐演化为思维经济或“简约性”(parsimony/simplicity)原则。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对简约性的重视是伽利略以来的科学传统。^⑤

对“简约性”(simplicity/parsimony)原则最广为接受的解读是:“如果存在两个理论、猜想或陈述等,它们的其他条件都一致,而且两者对经验证据的描述水平相当,那么应该选择那个更简单的理论。”简言之,对于相互竞争的理论而言,简单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可取。^⑥进一步言之,理论的简约性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理论的结构;二是理论构件的抽象程度;三是理论的形态。^⑦就结构而言,简单的理论只包含一个自变量,因为每添加一个变量,都会增加理论的内涵,削弱它的外延,损害其简约性。针对

^① Hugo Keuzenkamp et al., “The Enigma of Simplicity”, in Arnold Keuzenkamp et al., *Simplicity, Inference and Modelling: Keeping It Sophisticatedly Simpl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 本文把“simplicity”和“parsimony”作为同义词对待,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所指并不相同,比如西蒙就指出“simplicity”的意思是参数稀缺,而“parsimony”则指原始数据中符号的数量与需要描述数据模式(分布规律)的符号的数量。参见 Herbert Simon et al., “Science Seeks Parsimony, Not Simplicity: Searching for Patterns in Phenomena”, in Arnold Keuzenkamp et al., *Simplicity, Inference and Modelling: Keeping It Sophisticatedly Simple*, pp.32-73.

^② Quoted from Alan Baker, “Simplicity”, in Edward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04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04/entries/simplicity/>, last accessed on 9 October 2018.

^③ [美]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本)》,伍德增补,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8-239页。

^④ 这是罗素对“奥卡姆剃刀”原则的阐释,参见 Bertrand Russell,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 p.172. 但是,科学家们对这一原则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和阐释,参见 Hauke Riesch, “Simple or Simplistic? Scientists' Views of Occam's Razor”, *Theoria*, Vol.67, No.1, 2010, pp.76-77.

^⑤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914.

^⑥ 这个操作化定义取自 Hauke Riesch, “Simple or Simplistic? Scientists' Views of Occam's Razor”, pp.76-77. 实际上,简约性的含义模糊,歧义很多。关于对简约性的不同理解,可参见 Jr. Hugh Gauch, *Scientific Method in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69-277. 后世有学者对“奥卡姆剃刀”做了不恰当的引申,认为即使对于关联性很小或者不相关的理论而言,简单的理论也更重要,参见 Scott Chase et al., “The Physics and Relativity FAQ”, 2018, <http://math.ucr.edu/home/baetz/physics/General/occam.html>, 2018年3月15日访问。

^⑦ 关于理论的简约性,本文在下文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阐发,参见卢凌云:“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87-88页。

第二点,变量的抽象程度要尽可能高。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概念,概念的抽象程度高意味着变量的内涵小、外延大,这样的理论才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理论的形态一方面指理论是经验定律(law),还是机制(mechanism)。定律的形式表达是“如果X,那么Y”,强调结果;机制着重过程,其形式化表达为“X通过A、B、C导致Y”。^①这里的A、B、C可以视为X和Y之间的序列干预变量。假设X要经过A、B、C三个变量的传导才会对Y施加影响,那么理论的内容就是一个四阶因果关系,即 $X \rightarrow A, A \rightarrow B, B \rightarrow C, C \rightarrow Y$ 。相比之下,如果是定律,理论的内容就是 $X \rightarrow Y$ 。显然,定律的内容远比机制稀薄。另一方面,理论的形态指理论模型是否纳入了复杂性和非线性等系统性特征,是否考虑到“偶然性、不确定性、间接效应、非意图性结果、人为错误、脆弱性以及其它众多非线性因素”。^②把上述因素纳入模型,会导致模型的复杂程度急剧上升。尽管复杂的模型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会提供更为深入的解析,但由于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它所能解释的类似事件数量会急剧减少,从而缩小理论的外延。简言之,如果我们把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定义为理论所能解释的事件的数量或范围,而非理论与某个事件的具体过程的近似程度,那么理论的解释力与其简约性成正比。理论结构越简单、抽象程度越高、性质越单纯,简约性就越强。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话来说,重要的理论要能用最少的内容解释最多的现象。^③

就判断理论的影响和传播而言,引用率是一个不完美但却被普遍接受的指标。^④从经验上看,在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确实是相对更简洁的理论。这些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大体系理论。^⑤这三大理论是针对同一类现象或事件——大国和平或战争——的竞争性理论。华尔兹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也是极

^①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p.141.

^② Barry Watts, “Ignoring Reality: Problems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Studies*, Vol.7, No.2, 1997, p.121.

^③ Milton Friedman,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14.

^④ 关于评价理论重要性的常见标准以及引用率的局限性,可参见卢凌云:“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9-79页。

^⑤ 本文涉及的著作引用率截止日期均为2018年9月7日。华尔兹、基欧汉和温特代表作的引用率分别为18688次、11851次和9862次, <http://scholar.google.com>, 2018年9月7日访问。华尔兹、基欧汉和温特的代表作分别为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7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s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少数在国际关系学以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学家。^①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被公认为简化程度最高。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经以此为由指责结构现实主义重结果轻过程,并强调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于把过程纳入国际关系理论。^②然而,他的理论最终放弃了过程追踪的初衷,转而直接以国际制度分配来解释国家间关系。无独有偶,温特(Alexander Wendt)在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发端之初,也曾大力批判华尔兹和基欧汉的“理性主义”,认为他们不仅缺乏反思精神,而且忽略了行为对结构的反作用。^③尽管如此,温特在确立他本人学术地位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把双向互动简化为结构对行为的作用,放弃了关于行为对结构反作用的探讨。基欧汉和温特“妥协”的动机难以推测,但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构造出了远比早期设想要简单得多的理论。本文认为,新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最后得以与结构现实主义分庭抗礼,成为国际关系学三大理论之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妥协”。此外,作为非主流的体系理论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引用率也较高。他的《世界体系论(第一卷)》(1976年)的引用率为16707次。

相比之下,那些理论内容较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学家,尽管其理论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影响和传播范围则要小得多。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976年)一书是一部公认的国际关系经典。该书的结果变量是战争决策,所以也可以视为三大体系理论的竞争对手。但其引用率不仅远低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1984年),也不如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年)。^④值得一提的是,杰维斯个人高度重视《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998年)一书,自称该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⑤然而,迄今为止,该书的引用率仅为1422次,不仅远低于《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不如理性选择学派的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的《政治生存的逻辑》(2003年)

① 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484.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86页。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该书引用率为6191次。

⑤ Robert Jervis, *Systemic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该引言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页。

和费伦(James Fearon)的《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1995年)。^①严格地说,这三种著作不适于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们的因变量不完全相同。不过,如果仅从内容含量上看,后两者比《系统效应》要简单得多:“政治生存理论”的解释变量是“选举人集团”(the selectorate)规模,因变量则是包括战争决策在内的公共政策选择;费伦最广为人知的论文是用三个变量来解释战争这种低效率的政治行为:(不对称)信息、(不可靠)承诺和(不可分割)议题。相比之下,《系统效应》一书无法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杰维斯的一个关键词是“战略互动”,对预期、共同进化、系统衍生物、间接效应和互惠互动等的强调极大地增加了理论的内涵,严重地降低了理论的简约性。

乔治(Alexander George)在方法论上声望很高。他和贝内特(Andrew Bennett)合著的《个案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2005年)是政治和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方法论专著之一,达到9520次,相比金(Gary King)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设计》(1994年)这一研究设计经典10073次的引用率,并不逊色。^②不过,最能体现乔治“过程追踪”方法水平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遏制:理论与实践》(1974年),引用率仅为1331;《外交政策中的总统决策:信息和建议的有效运用》(1980年),引用率为1116。^③这样的引用表现远不如三大体系理论家。

实际上,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是三大体系理论家,而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1989年)引用率为7065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1992年)引用率为19837次。^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993年)引用率为13878次,《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1997年)引用率高达22410次。^⑤福山和亨廷顿两位学者的共同点

^①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414. 这两部著作的引用率分别为4241次和3739次。

^②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Gary King et al.,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lexander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④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16, 1989, pp.3-1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2.

^⑤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22-49;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1997.

是行文简洁晓畅,而且他们的观点都可以用很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福山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民主制‘终结’历史”,亨廷顿的则是“不同文明之间要打仗”。

“奥卡姆剃刀”原则也能解释下述现象:尽管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政策相关性更强,但这方面专家的学术影响力却往往很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操作上讲,区域/国别特殊性研究往往意味着在单一自变量以外添加干预或者辅助变量,结果缩小了理论的内涵,加强了理论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政治学家中引用率最高的却是比较政治学家。斯科特(James Scott)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比较政治学家之一。他在《国家视角》(1999年)等系列著作中展现了对东南亚历史尤其是中南半岛、缅甸历史深入细致的理解,是非常“稠密”的描述。^①斯科特的著作追溯历史,审视现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政策相关性。然而,让斯科特广泛流传的可能并不是繁复的历史描述,而是其高度简约的理论。例如,在《国家视角》一书中,斯科特用“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或“政治标准化运动”(political standardization)来解释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斯科特的这部著作议题很重要,理论结构很简约,得到了广泛的参考和征引。相比起来,帕特南(Robert Putnam)或许是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社会科学家。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1985年)一书的引用率高达43022次,《独自打保龄》(2000年)一书的引用率也高达24856次。^②以《使民主运转起来》为例,它的场景虽然是在意大利,但其主要贡献是操作并推广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以此来解释政府绩效,极大地拓宽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得以获得跨学科广泛传播,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简单的理论由于能够化约为对世界的简单陈述,更可能引起不同专业学者的兴趣,从而扩大理论的影响,增强理论的生存能力。一般来说,高度简约的理论往往能够浓缩为一个概念、一句格言或一句话,朗朗上口,广为流传。前者比如“软实力”“社会资本”,后者比如“四两拨千金”“三个和尚没水喝”“低头不再抬头见”“大树底下好乘凉”。^③不仅如此,简单的理论也更容易引来挑战,而挑战本身就是对理论的有效传播。相反,一个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但如果其形式艰深

^①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上述两本的引用率分别为16779次和2728次。

^② Robert Putnam et al.,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01.

^③ 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第86、93页。

或复杂,该理论要获得影响和传播则会困难很多。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例。该理论最先由哈顿(James Hutton)在1785年提出。在1786-1795年间,哈顿把他的思想编辑成一部文字晦涩、结构复杂的两卷本专著。哈顿的著作是如此艰深,以至当时颇负盛名的地质学家里耶尔(Charles Lyell)也被迫承认他读不懂。布莱森(Bill Bryson)称之为“科学史上读者最少的重要著作”。后来,普莱菲尔(John Playfair)简化了哈顿的思想并将之公之于众,该理论才开始引起注意。到了1802年,即哈顿去世后五年,这一思想才广泛流传并逐步被接受。^①

二 简约性为什么重要?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评价而言,简约是重要性的一个必要条件。^②具体而言,简约的理论未必重要,但重要的理论往往是简约的。弗里德曼是“奥卡姆剃刀”原则的重要推广者。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两个要点均指向简约性:一是指出理论的前提/假定不必为真,甚至越不真实越有利于理论建构,因为真实的前提往往相对复杂;二是判断理论价值的标准在于预测的准确性,而易于检验的理论在结构上通常是简单的。^③弗里德曼的思想在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④甚至被誉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⑤“几乎所有教科书都颂扬它”。^⑥经济学家们通常对方法论问题漠不关心,但一旦遇到压力,都会不由自主地捍卫弗里德曼的立场。^⑦麦克阿利尔(Michael McAleer)在1997年采访了1969-1995年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期间共有40位获奖者,在世的有26位,麦克阿利尔给其中25位发了调查问卷,发现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认为简约性对他们的研

① Bill Bryson,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New York: Broadway, 2003, pp.66-67.

② 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第86-90页。

③ Milton Friedman,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pp.3-16, 30-43.

④ Lawrence Boland,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7, No.2, 1979, pp.503-522; Daniel Hausman,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3, London: Routledge, 1979, p.217; Daniel Hausman,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n Edward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03/entries/economics/>, last accessed on 7 November 2017.

⑤ Daniel Hausman,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n Edward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03.

⑥ Lawrence Boland,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pp.503-522.

⑦ Daniel Hausman,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p.220.

究至关重要。^①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给弗里德曼带来的巨大声望和学术影响见证了对简约性的追求广为接受。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简约性会如此深入人心?秦亚青指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令人叹服的“简约之美”。^②这个论断依据的是美学标准,重视优美和明晰的价值。显然,如果简约性的价值只是装饰性的,那么它对于社会科学就不是重要的。国际关系学家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简约性既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德,也不是好理论的终极标准。在一些情况下,它所遮蔽的要比阐明的多。^③

然而,本文认为,“奥卡姆剃刀”被广为接受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地讲,它是人类心理和认知结构约束的结果;客观地说,它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要求。其中前者针对受众而言,后者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下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加以分析。

(一)主观解释

从主观上讲,简约性偏好根植于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能力。所谓简约性偏好,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类更容易记住或更倾向于记忆简短而非冗长的语句。能够被迅速记住的、深入人心的思想在形式上必须具备两个特点:首先是简洁明快,其次是逻辑性强。形式逻辑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规则。逻辑性指理论构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例如,如果前提是P,推论是Q,而两者的关系符合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那么该理论必须能够简化为如下逻辑形式:“P导致Q;非Q,那么非P”。

但是,逻辑性强只是理论可传播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简约性,才构成充分条件。本文认为,人类对简约性的偏爱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定的。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人类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所面临的信息几乎总是不充分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并且总是受到情绪的影响;所以人类的决策会违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结果理性原则,呈现为一种在决策过程

^① Michael McAleer, “Simplicity: Views of Some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Science”, in Arnold Keuzenkamp et al., *Simplicity, Inference and Modelling: Keeping It Sophisticatedly Simpl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92-297. 弗里德曼本人收到了问卷,但没有接受问卷调查。

^②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沿革”,《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58页。

^③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ISQ Theory Note*, p.18, <http://individual.utoronto.ca/seva/parsimony.pdf>, last accessed on 15 March 2018.

中不断实施矫正的不充分的程序理性。^①简约性偏好可以视为人类对自身有限认知能力适应的一个结果。

费雷拉(Fernanda Ferreira)和帕特森(Nikole Patson)深化了西蒙的观点:人类的语言理解系统在面对句法和语义表达时并不追求细致、完整和准确。人的大脑通常借用快速、俭省的启示法(heuristics)来决定需要记住什么信息。为此,人们不仅经常粗浅地理解句意,而且有时候会直率地误读。^②这个观念颠覆了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即语言理解系统的首要要求是准确、详细地表征和说辞。反过来说,认知系统依赖快捷的启示法来完成初期的信息获取和筛选工作。这个特点被称为信息初期筛选(initial parsing)的最小努力原则。^③相比之下,按照理性选择的原理,认知系统要考虑所有潜在在相关信息来源,否则无法做出最优决定。然而,生物学研究却有了相反的发现:由于时间和资源的约束,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一小束快速、集约的启示法,而不是努力查找每一条潜在的信息,以实现理性算计。^④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受制于大脑工作能力的限度。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媒介和工具。所以,认知意义上的工作记忆其实就是语言的工作记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资源储存;二是计算。^⑤前者的对象包括文本的主题、所指形势的表征、从以前句子中得出的主要陈述,以及对正在阅读的句子表征等。^⑥后者处于人类思考的核心,包括比较、抽取以及逻辑和数字运算。工作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储存读者或者听众计算的半成品或成品,并从文本或者对话的连续不断的单词流中整合出观念。

工作记忆的储存和计算功能都是由激活机制(activation)来调节的。激活机制的差异导致了语言工作记忆能力的不同。工作记忆的一个普遍特性是进行最小化语法分析:语言系统的决定原则是工作记忆约束的结果。具体而言,语言系统一次只计算

①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 1985, pp.293-304.

② Fernanda Ferreira and Karl Bailey, “Good-Enough Representation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1, No.1, 2002, pp.11-15.

③ Fernanda Ferreira and Nikole Patson, “The ‘Good Enough’ Approach to Language Comprehens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mpass*, Vol.1, No.1-2, 2007, p.72.

④ Gerd Gigerenzer et al.,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Marcel Just and Patricia Carpenter, “A Capacity Theory of Comprehens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99, No.1, 1992, pp.122-123.

⑥ Walter Kintsch and Teun van Dijk, “Toward a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85, No.5, 1978, pp.363-394; Teun van Dijk and Walter Kintsch,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一个分析单位,因为计算超过两个句法结构负担会太重。倘若不能及时地计算一个结构,该结构涉及的单词会被保持在记忆中但得不到分析,这也会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所以,系统采纳最小化语法分析的倾向不是被操纵的(stipulated),而是工作记忆能力不足的结果。这个观点符合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说,那就是工作记忆系统的储存能力是有限的,只能保持一定数量的语段(chunks)。^①工作记忆的程度大约是三至四个独立的项目(item)或者语段(chunk),否则出错或者犹豫不决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②当然,如果被记忆项目可以与业已存在的知识或联系组成上位集团(superordinate groups),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项目被记住。^③而且,当语言内容超过了工作记忆能力的负荷,认知系统会自动地过滤信息,以实现语言结构的最小化。^④其实,早在1885年,艾宾豪斯(Solgen Ebbinghaus)就发现,人类记忆的跨度(span)是七个音节。1950年代,米勒(George Miller)发展了艾宾豪斯的思想,提出人的记忆受到“心理单元”数量的限制。无论记忆对象的性质如何,人们可以记住的只有五或六组信息。对于人类记忆来说,7是魔幻数字,9往往是人类记忆的极限,而5则是人的常规记忆容量。^⑤

综上所述,人的大脑和神经结构适合于记忆相对简单的语句或陈述。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现象或规律的陈述,其理论陈述的结构和逻辑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反过来说,理论涉及的自变量或干预变量越多,因果链越多、越长,就越容易被遗忘。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基本观点是国际互动塑造国家的政策偏好,政策偏好继而显著地影响外交政策。塑造政策偏好的国际互动主要有三种:身份/认同的国内安排、市场刺激以及国内政治制度。通过这三种国际互动,莫劳夫奇克把理想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共和

^① George Miller,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63, No.2, 1956, pp.81-97; Nelson Cowa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Behaviou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24, No.1, 2000, pp.87-185.

^② Donald Broadbent, "The Magic Number Seven after Fifteen Years", in Alan Kennedy and Alan Wilkes eds. *Studies in Long-Term Memory*, London: Wiley, 1975, pp.3-18; Nelson Cowa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pp.87-185.

^③ George Miller,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p.81-97. 当然,要增强工作记忆能力,还可以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比如通过快速学习项目间的联系,或者通过在一个重复的语音系列里不断操练,等等。Nelson Cowa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pp.87-185; Alan Baddeley, *Working Memory*, Cotswolds, MN: Clarendon Press, 1986.

^④ Fergus Craik and P. Masani, "Age Differences in the Temporal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58, No.3/4, 1967, pp.291-299.

^⑤ George Miller,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p.81-97.

自由主义整合了起来。^①从变量抽象程度来看,他的理论高于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国际关系学家耳熟能详的民主和平论,但莫劳夫奇克的理论包括两个阶段(从相互依存到偏好以及从偏好到行为)和三条因果链(国内安排、市场刺激和国内政治制度),在逻辑上远比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复杂。排除其他因素,文章相对复杂或许是该理论影响较小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

人的工作记忆能力也受到年龄和老化程度的显著影响。记忆连贯的语言需要在记忆中保持多条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不能化约为单一的语段。当语言材料超过了工作记忆的能力限度,与年龄相关的赤字会急剧增加。^②经验证据也表明,随着成年人不断老化,他们的工作记忆所能储存的单词数量以及所能保持的语段数量都绝对下降。^③基克里特(Amanda Gilchrist)等在较近研究中的发现为这个假说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虽然在完成复合句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劣势,但是确实只能记住更少的单词。^④如果说年轻人擅长逐字记忆,那么成年人的这个能力要低得多,转而依赖掌握要领或文字材料的整体特性来记住新知识。^⑤例如,对于年龄大一些的成人来说,如果要把两个单词组合成一个强联系单位,也就是说这个联系或捆绑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会感觉很困难,其工作记忆的语段大小明显下降。但是,如果通过不断的配对或者建立更多的语义联系,成年人就会更有可能记住这些语言单位,年龄所产生的差别会显著降低。^⑥鉴于成年人驱繁就简的认知特性,可以判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会本能地回避那些烦琐、复杂的理论。

①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1997, pp.513-553.

② Fergus Craik and P. Masani, “Age Differences in the Temporal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58, No.3, 1967, pp.291-299; Donald Kausler, *Learning and Memory in Normal Aging*,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③ Mosher Naveh-Benjamin et al., “The Associative Memory Deficit of Older Adults: the Role of Strategy Utilization”, *Psychological Aging*, Vol.22, No.1, 2007, pp.202-208.

④ Amanda Gilchrist et 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for Spoken Sentences Decreases with Adult Ageing: Recall of Fewer but Not Smaller Chunks in Older Adults”, *Memory*, Vol.16, No.7, 2008, pp.773-787.

⑤ Lars Backman and Lars-Goeran Nilsson, “Prerequisites for Lack of Age Differences in Memory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Vol.11, No.2, 1985, pp.67-73; Elizebeth Stine-Morrow et al., “Age Differences in Re-reading”, *Memory & Cognition*, Vol.32, No.5, 2004, pp.696-710.

⑥ Harvey Taub, “Coding for Short-Term Memory as a Function of Ag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Vol.125, No.1, 1974, pp.309-314; Janine Hay and Larry Jacoby, “Separating Habit and Recollection in Young and Older Adults: Effects of Elaborative Processing and Distinctiveness”, *Psychology & Aging*, Vol.14, No.1, 1999, pp.122-134; Mosher Naveh-Benjamin et al., “Adult Age Differences in Episodic Memory: Further Support for an Associative-Deficit Hypothe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Vol.29, No.5, 2003, pp.826-837; Mosher Naveh-Benjamin et al.,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Immediate Serial Recall: Dissociating Chunk Formation and Capacity”, *Memory & Cognition*, Vol.35, No.4, 2007, pp.724-737.

综上所述,人对知识的习得是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人的语言认知系统主动适应信息输入的结果。总的来说,人脑倾向于保留简单而非复杂的信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这个选择效应会日益加强。

(二)客观解释

相对于复杂的理论,简单的理论也更能满足研究设计的需要。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对复杂的社会世界进行抽象,以建立理论模型和可供检验的命题。^①在这个过程中,“奥卡姆剃刀”很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

简约性强调产生可普遍化的解释,并改进因果推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约主义涉及研究的两个环节:一是理论建构;二是经验检验。对于两者来说,简约都具备强大的工具价值。科学的首要目的是理论建构。按照华尔兹的观点,理论是张地图。由于绘图目的的不同,不同的地图重视地形和风景的不同维度,所以不可能细致地描摹现实,而必须忽略地形或风景里那些次要的因素,从而导致现实的简化和扭曲。^②华尔兹进一步强调:“解释能力来源于远离现实,而不是接近事实。对于现实的全景描述是最缺乏解释力的。一个优美的理论解释能力则最强。……脱离现实并不必然是好的,但除非人们能够另辟蹊径,我们只能描述而无法解释。”^③

从形式上看,理论是一个或一个以上自变量(X)和因变量(Y)构成的逻辑结构。在内容上,X到Y的逻辑关系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可以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有回路的。对于理论家而言,选择一个自变量和单向的单一逻辑关系所构建出来的理论最简约。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的极简理论,其自变量是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因变量是国家间战争或和平,针对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单一的结构影响而不探讨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作用。极简理论作为理论建构的结果会呈现出高度的简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建构过程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作者经过简化工作,保留了最重要的自变量以及它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和识别重要的自变量也就是寻找研究问题的过程,兼具艺术性和工具性。^④林逸夫尝言,学者之间层次的区别,就在于能否从成千上万的变量中找到那个最重要的变量。^⑤这是个很艰难

①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

②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913.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

④ 卢凌宇:“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74页;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第68页。

⑤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18页。

的过程。

简约的理论也为经验检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用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话来说,“如果(追求)知识是我们的目的,那么简单的陈述应该被置于更高的地位,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更多、因为它们的经验内容更丰富、因为它们更容易检验。”^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于难于理解或意义隐晦的理论,那些易于掌握和理解的理论天然地更易于评估。“平易近人”的理论增加了潜在的批评和理论可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简约性有助于理论接受批评,让自己变得更加严密。一个理论面对的受众及其评价越多,它潜在的逻辑和经验错误就越有可能暴露出来,同时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修正自身并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

三 简约性与真实性:实在论的批判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简约性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个特质。^②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工具主义者。国际关系学中最著名的工具主义者是华尔兹。^③弗里德曼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面旗帜。华尔兹则明确地提出自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依赖反现实的核心假定、以演绎-法则建模为核心以及简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都由弗里德曼奠定。^④

然而,在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简约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支持者认为它是

^①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Routledge, 1959, p.142.

^② 简约性有不同的类型划分,例如:(1)句法性简约和本体性简约;(2)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3)本体论、认识论和美学,分别参见 Alan Baker, “Simplicity”; Hauke Riesch, “Simple or Simplistic? Scientists’ Views of Occam’s Razor”, *Theoria*, Vol.67, No.1, 2010, pp.78-80;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p. 1-18.

^③ 有学者认为华尔兹是实在论者。实际上,华尔兹是一个折中的“工具主义者”。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实在不可知。另一方面,他认为理论的功能不是预测,而是解释。参见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第76页。切尔诺夫则称华尔兹是“反实在论”者,参见 Fred Chernoff,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6, No.2, 2002, p.192.

^④ Terry Moe, “On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Rational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 2, 1979, pp.215-243; William Rik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 eds., *Posi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3-181; 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 Map”, in Mark Lichbach and Alan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Y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17-133; Jorge Rivas, “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Social Theor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ch 22-25, 2006, San Diego, USA, p.5.

任何好的理论的基本特点,而怀疑者则斥之为对于现实天真甚至危险的简化。”^①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理论的简约性与描述的准确性难以两全,顽固地拒绝简约性。^②

工具主义的简约性追求与理论的“非真实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性。这种非真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假定(assumption)不真实;二是过程不真实;三是预测不真实。弗里德曼本人提出理论假定是否真实并不重要。由于不真实的前提往往较之真实的前提简单,所以,不真实的前提更有助于演绎出解释力强的理论。^③类似地,赫希曼(Lucas Hirschman)既肯定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对于理论建构很有用,同时又提醒说不要把这个假定当作事实。^④同样重要的是,弗里德曼以预测的真实性替代了假设的非真实性。他同时指出,所谓“预测”不仅是前瞻性的,也可以指向尚未揭露的历史事实。^⑤换言之,我们可以使用发生的历史来检验理论。由于猜想是否被历史事件所验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阐释历史事实,^⑥这就降低了预测失败出现的概率。

弗里德曼的短板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预测记录差强人意,而且越是重要的事件,预测成功的概率越低。^⑦尽管如此,同为工具主义者的华尔兹指出,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描述和解释。^⑧预测绩效低下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两个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人的反思和预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生性,以至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预测获得了成功,还是人的反思改变了预测结果。^⑨

工具主义是结果导向的,认为理论建设的目的是提出易于被检验和预测的理论,所以并不关心理论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正如劳丹(Larry Laudan)所言,成功的预测并不指向“真理”,否则就无法解释燃素论、热质论和电磁以太这些后来被公

①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

② Ibid., p.10.

③ Milton Friedman,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p.4, 7.

④ Albert Hirschman,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1, No.1, 1985, pp.7-8.

⑤ Milton Friedman,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p.9.

⑥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p.916-917.

⑦ Mark Blyth, “Great Punctuations: Prediction, Randomn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0, No.4, 2006, pp.493-498;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3-145页。

⑧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8-9.

⑨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第145-146页。

认为错误的理论能够做出很多正确的预测。^①在统计分析、形式模型和个案研究这三种国际关系学主流研究方法中,前两种有着很重的工具主义色彩。形式模型与统计分析的结合是广受推崇的研究设计。更常见的研究设计则是非形式化理论结合统计分析。形式模型使用数学语言对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或作用做严密的逻辑推导。非形式化模型同样遵循形式逻辑规则,但使用自然语言,其相对优点是易于理解、可以容纳难以计算和观察的变量,缺点则是缺乏数学语言的严密性。但无论是使用形式语言,还是非形式语言,理论建构都旨在刻画 X 和 Y 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可能有很多种,表现为不同的路径。比如,“民主和平论”下的自变量是单个或一对民主国家,因变量则是国家间战争或和平。这个理论的核心逻辑是“民主国家”如何导致或带来国家间和平。常见的逻辑有三个,分别强调“民主国家”的行为规范、制度约束和信息条件。^②显而易见,不同的逻辑对应不同的机制和过程。通常的经验检验则是寻找 X 和 Y 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如果经验检验的结果是民主国家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是显著且正相关,那么我们就认为民主和平论得到了支持。然而,常见的研究设计无法揭示到底是三个机制中的哪个机制在起作用,还是其中两个或所有机制都在发挥作用,或者是未曾观察或探讨的其他机制在施加影响。

单一或比较个案研究是定性分析的主流,但个案分析并不天然地关注过程。个案研究的工具主义导向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比较个案研究违反统计学中的自由度原则。比较个案研究虽然是定性研究,但必须遵守统计学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原则。通俗地讲,自由度原则要求案例的个数必须大于自变量的个数。例如,如果自变量是一个,那么案例至少要有两个;如果自变量有两个,那么案例至少要有三个;如果自变量有三个,那么案例至少要有四个,以此类推。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但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多国平衡的局面,中国则走向了统一?许田波提供的解释是: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参与竞争的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中国的诸侯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政策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clever strategies),前者指法家改革,后者则是

^① [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理论》(第四版),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56 页。

^② Seung-Whan Choi and Patrick James, “A Review of Democracy, Peace, and Other Things”, *Civil-Military Dynamics,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dvance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7-21.

纵横家的外交手段。相反,欧洲国家则采取了自弱型的改革政策(self-weakening expedients)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中国的国家力量在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中越来越强大,于是就迎来了秦帝国的统一,而欧洲却因为采取了自我弱化的对策和“笨拙”的外交策略,在近代的发展中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①

在许田波的研究中,自变量有两个:一是改革类型,即自强型改革还是自弱型改革;二是外交策略,即灵活外交还是笨拙外交。^②由于该书包含两个案例的比较个案分析,所以,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模型中应该只能设置一个自变量,或者将个案扩充为三个,许田波显然违背了这个原则。然而,如果不考虑自由度原则,对于任何一个类似的问题,要提出不同的答案都是很容易的。正如赵鼎新所言:“只要一个学者有着说得过去的完形能力,他所提供的解答在外行看来也总有一定的道理。”结果就是“一个理论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而已,它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形式理论”。

二是结果导向的个案分析。这也是金(Gary King)等所主张的定性研究。^③具体而言,这样的研究追踪不同时间点上X和Y的变化,然后寻找Y和X变化的相关性,从而做出理论推断。泰勒(Brian Taylor)和波迪(Roxana Botea)拓展了蒂利(Charles Tilly)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④蒂利根据近代欧洲基于中世纪晚期西欧现代国家生成的历史经验指出,统治者为了应对或消灭国内外的挑战者,被迫向境内的人口汲取财政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以税务、财政部门为主的官僚机构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同时带来整个国家机器的全面扩张。^⑤这两位作者在蒂利的模型中加入了两个干预变量:一是族群政治,即是否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一个作为政治共同体基石的核心族群;二是战争的同时发生革命。他们以二战后的越南内战和阿富汗战争为案例,发现由于这

^① 也可参见 Victoria Tin-Bor Hui,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sights from Comparing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1, 2004, pp.175-205; [美]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夏红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6页。

^② Victoria Tin-Bor Hui,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sights from Comparing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175-205.

^③ Gary King et al.,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④ Brian Taylor and Roxana Botea, “Tilly Tally: 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1, 2008, pp.27-56.

^⑤ Charles Tilly,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Formation”,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601-638;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69-191;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2, pp.67-95.

两个因素的不同组合,越南内战促进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提高,而阿富汗内战则严重削弱了国家建设。这个研究也违反了自由度原则。更重要的是,泰勒和波迪个案研究的重点是比较越南统一和阿富汗内战结束前后两个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军事武装力量和政治合法性的变化,并没有使用解密档案或相关论著跟踪或详细描述因变量由于战争、族群政治和革命发生与否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实在论是工具主义的批判者,认为工具主义至少不符合过程真实性的标准。根据著名实在论者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经典表述,实在论判定导致一个事件或现象的因素是外在的。它既不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也不是我们的思想结构或者语言。^①换言之,存在一些相互关联的实体,共同构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世界的结构。^②在国际关系学中,温特旗帜鲜明地倡导实在论。温特宣称他的温和建构主义基于三个原则:一是世界独立于个体观察者的思维和语言;二是成熟的科学理论典型地指涉外部世界;三是外部世界可能无法被直接地观察到。^③温特及其拥趸不仅推崇和传播科学实在论,而且批判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实在论。^④

从方法特征上讲,如果说工具论者只关注可观察和可度量的变量,系统地分析变量间的统计关系,期待做出简约性的解释,那么实在论者则重视挖掘社会事实本体论上的深度和复杂的因果关系。一些实在论者认为,在人和社会的世界,由于无法做可控实验,既难以分离因果关系的影响因素,又克服不了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有必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同时面对因果复杂性,提供足够细致的概念体系和解释叙事。^⑤国际关系学中实在论者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即识别特定的案例中因果关系的不同步骤并辨明特定历史场景下给定变量的结果。过程追踪区别于回归分析或者结果导向的个案研究之处在于对于干预变量的处理:对于后者而言,只需要探讨它们的“可观察的含义”;而在前者,每个干预变量都是因果链

^① Hilary Putnam, “What Is Mathematical Truth?”, *Historia Mathematica*, Vol.2, No.4, 1975, pp.529-533.关于实在论的不同类型,参见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七章。

^② [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理论》(第四版),第256、261-262页。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51.

^④ Fred Chernoff,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6, No.2, 2002, pp.192-199. 也可参见 Jonathan Joseph and Colin Wight eds., *Scientific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⑤ Milja Kurki,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Democratization: Do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tter?”, in Jonathan Joseph and Colin Wight eds., *Scientific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39-141.

的一个步骤。^①

尽管如此,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在本体论上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认为社会世界并不简单,天然地比自然世界要复杂。华尔兹坦言,简约性并不是世界的本体,而是为了理论世界而使用的认识论启示。^②这个认识符合人类社会的特点。实际上,本体论简约主义只适用于理论物理的世界,所谓从本体简约性到理论简约性的传导也主要对应理论物理学。物理学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用日益简化的理论来解释物理现实的本质。在物理学中,美丽与真实变成了同义词,^③其经典案例是爱因斯坦对麦克斯韦八个场方程的整合。相反,在人类社会,简约所必需的对称性是缺位的。社会关系不仅不对称,而且由于基本研究对象是有动机和行为能力的人,^④因此呈现出类似于“量子纠缠”的特点。政治学家们都承认自然世界不同于社会世界。由于人的反思性以及广泛的人际互动,社会世界远比自然世界复杂,成为杰维斯所描绘的密集的和战略互动所构成的复杂系统,^⑤不符合本体的简约性。

四 实在论与真实性:工具主义的回应

简约性是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内在逻辑冲突的集中体现。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对社会本体复杂性的认同掩盖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针对实在论的批判,工具主义者做了很多有力的辩护,包括现代早期的神学、当代的概率论和统计学上的辩解。^⑥本文认为,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在简约性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否包括认识并还原复杂的社会本体;二是社会科学家能否认识并还原复杂的社会本体,前者涉及意愿,后者则是能力问题。工具主义者对两个问题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一) 主观反驳

实在论对简约性的批判集中于简约的理论无法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这里隐含

①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176-177.

②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0.

③ Ibid., pp.5-6.

④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No.5, 1998, p.102.

⑤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3-18页。

⑥ See Alan Baker, “Simplicity”.

着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科学知识(应该)是真实世界的镜像。这个假定是人们对科学的一个基本信念:科学与经验或事实相符合,科学发展是事实的积累和永恒真理的积累。^①然而,在工具主义者看来,实在论的这个信念可能只是空中楼阁,难以成立。^②科学与其说是事实的投射,还不如说是科学家的信念。理论是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观念选择的结果。巴恩斯(Barry Bares)深刻地指出,知识未必是正确的信念,而只不过是群体接受的信念。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并不具备超然的地位。科学知识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也必须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所以描述也受到理论和文化的制约。科学作为一种理论知识,未必是对实在的描述,也未必是客观的。人们关于世界的图景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不然就无法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信念,其中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的真理。^③不仅如此,人们的信念并不轻易地被新的证据所纠正。信息经济学倾向于认为不对称或不完全的信息导致了人们的认知偏差,其逻辑结论是如果克服了信息问题,人们对特定事件的认知会向一致回归。然而,赫曼(Richard Hermann)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关于事实的信息就越是倾向于两极化而不是趋同。也就是说,人通常不会改变自己的观念,而只会强化既有的信念。^④

科学知识由权威科学家和学术共同体来认证。巴恩斯强调说:“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⑤如果缺乏集体认可,科学知识是无法作为“真理”流传下来的。“客观”的科学只不过是“被大多数科学家承认为科学”而已。^⑥库恩(Thomas Kuhn)深刻地指出,科学家们很重视“简单、精确、同其他专业所用的理论一致”等价值,但是更重要的价值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科学家群体意见一致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可尽量减少群体内部冲突的诱因,使之迅速统一于一组单一的解决疑难的规则,甚至不惜进一步划分专业范围或排除一位

①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② 关于非实在论对实在论的系统批判,可参见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第十七章。

③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译者前言,第3-6页。

④ Richard Hermann, “How Attachment to the Nation Shape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 Theory of Motivated Reaso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1, 2017, pp.61-84.

⑤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4页。

⑥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88页。

曾经卓有成就的成员。”^①

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也决定了理论能否揭示真实。社会事实有三种类型:事件、过程和因果机制,验证或证伪的难度渐次增大。事件相对较易认定。事件认定主要的挑战是概念的界定。比如,关于内战的发生,就有每年阵亡 25 人以上或 1000 人以上两个标准。^②按照不同的指标,一场政府与反政府组织间的武装斗争会被界定为内战或非内战。过程是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历史进程,认定的难度介于事件和因果机制之间,既依赖概念的界定,又必须根据一手或二手史料对事件的过程进行追踪。但是,国际关系学涉及的社会事实主要是因果机制,这也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主要区别。波义德(Richard Boyd)认为,科学实在论的一个信念就是有证据表明在规律或理论所度量的实体间存在着因果关系。”^③在这个问题上,解释性实在论(explanatory realism)和解释性非实在论(explanatory irrealism)分庭抗礼。解释性实在论秉承实在论的传统,认为因果关系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即使因果关系涉及人的意识和动机,事件本身也有自己独特的因果历史,独立于言语和表达。由于坚持认为事件的存在和特点本身是客观和决定了的事实,解释性实在论等同于因果实在论。相反,解释性非实在论则强调,因果关系在本质上依赖于对我们所描述的现象或事件所做的思维链接(interlocking),链接的材料由我们已经接受的理论来提供。根据这个思路,因果关系的存在取决于推理-逻辑联系,处于我们已有的认识范围(corpus)内,而不必根植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所谓客观联系。这就解构了解释性实在论,把因果关系转化为一种非客观的心理-认识论关系,不再是解释性实在论所期待的那种事实上的联系。^④根据解释性非实在论,知识和理论只不过是一种信念。因果关系是无法验证的,甚至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因果关系是真的、客观的,还是只是认知心理的投影和影响,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

① [美]托马斯·库恩:“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作用”,[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5 页。

② 关于这两个分类标准,分别参见 Nils Gleditsch et al.,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9, No.5, 2002, pp.615-637; Daneil Jones et al.,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92: Rationale, Coding Rule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15, No.2, 1996, pp.163-213。

③ Richard Boyd, “Realism, Underdetermination and a Causal Theory of Evidence”, *Nous*, Vol.7, No.1, 1973, p.1.值得一提的是,普特南本人在 1960 年代之后放弃了实在论。此后,实在论在自然科学中复兴了,但在社会科学中并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反弹。参见 Fred Chernoff,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93。

④ Jaegwon Kim, “Explanatory Realism, Causal Realism, and Explanatory Exclusio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12, No.1, 2010, pp.226-230。

大判断,会对科学评价产生方向性的影响。^①在科学史上,针对同一个(组)经验事实构建出数量上不受限制的多种理论的案例并不罕见,而这些理论关于现象背后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却往往很不相同,甚至相互排斥。这是否表明,科学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上的有效性与它所假想的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实体和过程的具体假定并无必然联系,与有效性显著相关的是理论构造的巧妙性和严密性。例如,对于冷战时期的霸权或大国和平,结构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分别用军事力量均势、国际制度分配和雅尔塔体制下的国际关系文化来予以解释,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各自的理论前提和因果性并不相同。乔治和巴内特注意到不同因素导致相同结果这一现象。他们的建议是研究者应该发展不同的经验理论,以辨明不同的因果模式。^②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则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概念归根结底是思维“自由创造”的产物,而科学理论关于所假想的存在于现象背后的基本实体和过程的种种假说,始终不过是一种猜测。本文接受工具主义的观点,把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视为认知心理的投影和影响。如果说因果关系就是对必要条件的探索,那么这个结论印证了休谟(David Hume)的判断:“总体上,必要条件只存在于意识中,而不是在物体上。”^③

科学与真实相符合的表象也很可能是科学家操纵的结果。无论是基于利益考虑,还是观念和信仰的作用,科学研究受制于科学家的利益考量。理论受到实验的反驳,或者理论内生了逻辑矛盾,都会使理论遭受严峻的挑战,但科学家们往往会坚持错误的理论,拒绝放弃长期以来确立的范式。^④无论批评本身在逻辑、理论和经验上如何令人信服,都会受到被批评者的有力反驳。他们会坚持认为需要改进的不是他们的理论,而是逻辑本身。^⑤国际关系学三次大争论的结果是,年青一代从争论中受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但科学主义仍然是科学主义,传统学派仍然是传统学派,实证主义者仍然坚持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者仍然固守后实证主义的立场。^⑥结构现实主义主张均势是维持大国和平的关键变量。冷战的和平终结显然质疑了这一理论,但华

^① Jaegwon Kim, “Explanatory Realism, Causal Realism, and Explanatory Exclusion”, p.232.

^②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161-162.

^③ Quoted from Jaegwon Kim, “Explanatory Realism, Causal Realism, and Explanatory Exclusio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12, No.1, 2010, p.229.

^④ 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7-140、145-146页。

^⑤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85页。

^⑥ 关于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争论,可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127、222-255页。

尔兹继续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指出除非国际关系发生体系性变革,结构现实主义就永远有效。^①

知识操纵不仅存在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渗透到知识的传播过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科学与其他文化并没有实质性的重大差异。科学的传播者希望人们相信他们所传播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他们会对理论进行简化和“阉割”,以便受众相信和理解。知识的传播也是选择性的。传播者所选择的总是符合理论期待的成功案例,同时隐瞒理论的局限性,而且不传播合理性规则、普遍的方法或构成理论的标准。^②《独裁者手册》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的普及版。^③作者对《政治生存的逻辑》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工,删除了原著中所有的技术性内容,并且绝口不提挑战者对该书强有力的质疑。^④经过改头换面,“科学家更多的是处在预言者的位置。而且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对其信徒实施超凡影响的人”。^⑤

(二) 客观反驳

在客观上,追求真实性首先超出了学者的能力。首先,知识与事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从科学知识演化的历程来看,知识的进步是由“证伪”(falsify)旧的知识来实现的。证伪的原初意义是如果一个事实和理论猜想不符合,那么理论就被否证了。证伪这个标准的确立意味着知识的真理性是时间敏感的。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出现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被接受为真理;在拉瓦锡发现氧气之前,燃素说曾被广为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科学知识或科学家事实都是相对事实。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认为,“任何一个理论都会被某些实验否证。”^⑥既然在某个时期最受尊敬的理论“总会遭到修改或抛弃”,那么,“把今天最好的理论当作真的就是否认了历史教训”。^⑦鉴于科学的这个特性,莫兰(Edgard Morin)把科学的历史描述为“一部充满不负责任的梦想、执拗的念头和错误的历史”,尽管科学的优点在于“(它的)错误被系统地记录下来,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十分经常地予以纠正”。^⑧

①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00, pp.5-41.

②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译者前言,第6、87页。

③ [美]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独裁者手册》,骆伟阳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④ 例如 Kevin Clarke and Randall Stone, “Democracy an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3, 2008, pp.387-392.

⑤ [英]巴里·巴恩斯:《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87页。

⑥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1992, p.93.

⑦ [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理论》(第四版),第263页。

⑧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40页。

怀特海(Arnold Whitehead)认为,“科学比神学更加多变”,因为“神学由于建立在超自然的可验证的世界的基础上而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建立在自然世界基础之上的科学总是面临着被否定的可能性”。^①社会科学则比自然科学更加多变。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根科(Stephen Genco)进一步指出:^②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尤其是物理事实存在本质的差异。政治本质上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纯偶然性的,而是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称为“灵活控制”。相应地,政治学中的规律(regularities)也是软的,根植于历史,涉及“一闪而过”的人类的记忆和学习过程、仓促地寻找目标的冲动等。这些规律都是短命的。投票行为理论是政治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理论的。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领域,所谓的规律也是变化多端的。以1930年代至1960年代早期的数据为经验基础,学者们曾一度认为党派和候选人形象是美国人投票的决定因素。然而,1970年代初的经验发现推翻了这个规律。^③从逻辑上看,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可能都会被证伪。

其次,理论的真实性的受制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以致很难像波普尔所建议的那样去证伪。政治/国际关系学家普遍接受波普尔的“证伪”思想。华尔兹更进一步,支持并拓展了拉卡托斯(Irme Lakatos)的观点,认为理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④

第一,从逻辑上讲,要证明一些事情是假的同时必须证明另一些事情是真的。这是一个逻辑困境: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一些事情是真的,又何必反过来证明另一些事情是假的呢?既然如此,波普尔的“判决实验”很难实施。而且,在判决实验中,人类的观察会起干扰作用,因为检验的结果需要阐释。^⑤更重要的是,评价一个理论需要在理论的含义和不确定的状态之间反复甄别,而这些事态就是我们藉以评价理论的所谓经验基础。华尔兹举例说,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是证实还是证否了结构现实主义,既取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阐释理论和事件。无论评价本身如何彻底,我们都没有把握说理论是真的。他在为均势理论辩护时指出,均势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现实状态。这就好比物理学上的重力定律。定律可以被打破,结

①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9-10页。

② Gabriel Almond and Stephen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9, No. 4, 1970, pp.489-497.

③ *Ibid.*, pp.493-497.

④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p.913-916.

⑤ Errol Harris, *Hypothesis and Percep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0, p.103.

果是付出代价;人们打破了定律,付出了代价,不是证伪了定律,而是反过来证明定律是成立的。^①凡斯奎兹(John Vasquez)反驳说华尔兹的辩护消解了证伪。^②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选择证伪的初衷是由于证实无法为理论提供充分的经验支持。如果事实本身难以分辨甚至无法辨别,那么也就抹杀了证伪和证实的区别。

第二,理论建构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实际上,这个前提是满足不了的,^③所以理论的真假也就很难辨识。乔治和巴内特承认,对于绝大多数现象而言,每次变化的因素不止一个。这是最大的难题。他们建议进行过程追踪,追踪的对象包括某一时刻的主要变量,以及同一时间变化的其他变量。唯有如此,才能确认特定关系是否属于因果关系。^④然而,过程追踪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它始终被“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问题所困扰。^⑤单一个案研究会明显违背统计学上的自由度原则,而多个案研究又会导致研究的时间成本急剧上升,在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可操作性。然而,如果从单一个案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无法普遍化,那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就被抹杀了。此外,过程追踪过度依赖史料,强大而绵长的因果链即使只在其中一个环节缺乏相应的史料印证,追踪即告失败。而且,如果追踪的结果是发现超过一个因果机制,那么,研究者要进一步探讨未曾预料的解释与猜想是相互补充,还是互相矛盾。这就牵涉大量的时间投入,^⑥极大地增加了探明“真相”的成本。

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由于难以从事可控实验,“其他条件不变”这个前提对于理论检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这些理论既不可证实,又难以证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理论或许都是规范理论。也正因为如此,拉卡托斯才指出研究纲领的评价标准是让科学受益(fruitfulness),一个理论只能被更好的理论推翻。^⑦华尔兹则引用温伯格的观点,认为根本不必去判定一个理论的真假,而要判断它是否值得认真对待。^⑧

①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915.

②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 899–912.

③ 也可参见[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理论》(第四版),第263页。

④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166–167.

⑤ Ibid., pp.170–171.

⑥ Ibid., pp.222–223.

⑦ 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19.

⑧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916.

以上分析印证了华尔兹对社会世界本体的认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认识到它的真相，所以政治世界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规律。^①既然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假定在可观察到的模式后还存在任何更深层的‘真实’。理论并不必然要反映深层次的真相，也没有必要去假定存在这样的深层次真相”。^②从逻辑上说，由于我们只能从由理论所导出的检验蕴涵去对它进行检验，因而即使它的所有检验蕴涵迄今为止都被证实为真，我们也始终缺乏逻辑上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些关于基本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真的。进一步言之，如果我们假定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么就不是证据决定理论，而是理论选择证据。^③

五 结论：“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

从认识论上看，一部科学哲学史就是工具主义和实在论论争的历史。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也渗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中，例如1950-1970年代科学主义与传统学派的论战以及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之间的交锋。

简约性是工具主义的理论建构追求。工具主义者认为，理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然而，真实的世界不可知，理论家可以无限逼近真实的世界，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工具主义推崇结构简单、外延宽广的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学者的使命是从成千上万的变量中找到那个相对最重要的变量。这样的理论不仅符合人类神经系统和认知结构的进化水平，便于理解和传播，而且相对易于建构和进行经验检验。

实在论认为，理论应当尽可能地反映现实。如果现实是复杂的，理论相应地也要复杂。相对于简单的理论，复杂、相机的理论更可能准确地反映真实世界。^④而且，理论的复杂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现实能否充分简化。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解释那些涉及相机、非线性的动态过程或反馈回路的现象——例如密集的和战略性的互动所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简约性可能要被牺牲掉。^⑤

^①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1.

^② 杰克逊在评价华尔兹的哲学取向时指出，华尔兹的观念是工具主义的，他认为理论并不能揭示那些真实而难以观察到的世界的成分。（科学）的目的是提供一套或多或少有助于理念化或者高度简化的理念化产品。它们被用于把复杂、混沌的经验现实组织成可理解和可掌握的形式。参见 Patrick Jackso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37, 113.

^③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p.913-914.

^④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p.6-7.

^⑤ [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中文版前言”，第1页。

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鉴于政治和国际关系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机制分析和过程追踪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进步至关重要。尽管主流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普遍受工具主义的影响,但学者们在情感上更倾向于支持实在论,^①至少倾向于认为在复杂、难以观察或无法观察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事实。认识论上的这个分裂可能源于实在论提供了确定性这一精神世界的安全阀,是社会科学家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实在论者指责工具主义背离了事实,是一种错误的信念。本文倾向于支持下述观点: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一样,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题,究其本质也是人们的一种信念。^②

简约的理论不仅是优美的,而且更有可能成为思想市场的宠儿。^③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④短短三年就得到广泛接受。科斯(Ronald Coase)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在思想和政策市场快速走红不仅是由于“它的有效需求分析似乎触及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本质”,而且在于《通论》“(它)比其他理论更易于理解(至少就它的大致轮廓而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会一直争论下去。大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的恢复似乎为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困局又似乎证伪了该理论。本文认为,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错误”而简单的理论比“正确”而复杂的理论生命力更强。如果说凯恩斯的理论是错误的,或者大概率的是错误的,那么它至少为这个判断提供了部分的支持。

实在论认为理论的优美是“奢侈品”。^⑤在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看来,简约的理论虽然赏心悦目,但不能被用作判断理论价值的标准。简约性是令人期待的理论品质,但并不是构建或者检验理论的必要条件。本文并不否认在政治世界,审美上的愉悦与世界的复杂性是不同维度的事件。但是,简约性可能并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附加品质,而应该是其常态。简单不仅是理论建构的判别标准,而且是理论建构的一个目的。怀特海警告说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简约性但别相信它”,提醒科学家们不要掉进“事实是简单的,因为简单是我们的追求”这样的思维陷阱,但是他同时强调“科学

① 翟振明:“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第16页。

② 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引论》,第十七章。

③ [美]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6页。

④ John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cMillan and Co., Ltd., 1936.

⑤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0.

的目的是对复杂的事实寻找最简单的解释。”^①类似地,华尔兹承认把概念转化为现实并赋予现实以因果性是很容易滑进去的思维陷阱,但这个认识并不妨碍他高度推崇简约的理论。从认识论上看,简约性是处理复杂性和相机性之间张力的有效途径,是面对复杂的现实时不可避免的妥协。一言以概之,至少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简约性并不是“必要的恶”,而且是“内在的善”。

科学是理论的集成。华尔兹把理论定义为“一副关于被划界的(人类)活动的领域或范围的精神图景”,^②刻画了这个领域内的组织以及其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任何领域内都有数不尽的材料,可能以无数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由于现实是复杂的,理论就必须简单。只有通过简化,理论才有能力凸显(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因素。^③基于上述理解,华尔兹批评了金(Gary King)等的观点:理论应该“像证据所揭示的那样复杂”,^④因为理论越复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能力越弱。进一步言之,由于社会事实是不可知的,所以,理论在本质上既非真实也非虚假。就像科斯深刻洞察到的一样,所有理论都能找到经验支持;如果找不到的话,作者也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做到在不利的经验证据面前自圆其说。^⑤这样的理论难以证伪,只能被更好的理论取代,或者被斥为解释力比较差的理论。鉴于此,理论的判断标准就不是真实与否,而是是否管用。^⑥

尽管简约性很重要,但无疑它不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在库恩看来,好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至少三个条件:一是精确性,指推论要和实验与观察的结果相匹配;二是视野的广泛性,尤其是“一种理论的推论应当远远超出它最初所要说明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三是简约性,因为只有简单的理论才能“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一团混乱的”。^⑦上文已经论证,经验上的“精确性”只是暂时的,但应该承认,能够得到认可的理论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得到了经验检验的有

^① Alfred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 1919,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8835/18835-h/18835-h.htm>, last accessed on 22 October 2017.

^②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p.913-917.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3.

^④ Gary King et al.,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20.

^⑤ [美]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31页。

^⑥ Anonymous, “Rival Views of Parsimony in IR Theory”, p.12. 这也是工具主义的普遍特点,参见[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理论》(第四版),第260页。

^⑦ 库恩共提出了五个条件,其他两个分别为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富有成果性,即理论要能够“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关系”。参见[美]托马斯·库恩:“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第322-342页。

力支持,从而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理论越简单,越容易辨别它在逻辑上是否周延。值得一提的是,理论视野的广泛性与简约性存在内生关系,因为理论获得广泛性的过程是对概念进一步抽象——例如从西欧国家建设到国家建设,抽象的结果恰恰提高了理论的简约性,反证了简约对于理论构建和评价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与其说是主张简约是理论评价最重要的标准,不如说揭示了通常所强调的“与数据相符合”并不是唯一的理论选择标准。^①

纵观社会科学的历史,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某种观念、范式或研究纲领一统江湖的局面。观念和范式的竞争是常态。意识到和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的冲突是保持科学生命力的前提。^②让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整个科学则会扼杀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奥卡姆剃刀”有助于创造简约、重要和易于传播的理论,但简单的理论内容稀薄、政策相关性低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是多样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只能有限地接近真实,但如果认为理论越接近真实越可取,或者认为解释力指的是对事件演化和机制尽可能“准确”的把握,对于简约性就会做出很不相同的评价。

(作者简介:卢凌宇,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盛,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简约性的含义模糊,歧义很多。关于对简约性的不同理解,可参见 Jr. Hugh Gauch, *Scientific Method in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25。

^②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12页。